

现代政治经济学

前·沿·译·丛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同意的计算

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

James M. Buchanan

Gordon Tullock

[美]詹姆斯·M. 布坎南 戈登·图洛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光金——译

现代政治经济学

前·沿·译·丛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同意的计算

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

James M. Buchanan [美] 詹姆斯·M. 布坎南

戈登·图洛克——著

Gordon Tullock

陈光金——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美)詹姆斯·
M.布坎南(James M.Buchanan),(美)戈登·图洛
克(Gordon Tullock)著;陈光金译.—2版.—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

书名原文: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SBN 978-7-208-14674-7

I. ①同… II. ①詹… ②戈… ③陈… III. ①政治制
度-研究-美国 IV. ①D771.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8982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同意的计算

——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

[美]詹姆斯·M.布坎南 [美]戈登·图洛克 著
陈光金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2.25 插页 4 字数 294,000

2017 年 8 月第 2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674-7/F·2475

定价 68.00 元

前 言

这是一本论述自由人社会的政治组织的书。它的方法论、概念工具以及逻辑分析法,本质上渊源于把这样一种社会的经济组织作为其主题的学科。对于所考虑的各种核心问题,政治学方面的研究者和学者会与我们一样感兴趣,而他们的经济学同行则会与我们一起对此论题的建构感兴趣。本书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政治经济学的这两大支系之间神话式的和神秘的边界线展开。

正因为如此,本书及其所包含的工作看上去与一切名副其实的竖“篱笆墙”的努力都极为相似。几如每一个农民所知,围起篱笆来耕作有得也有失。首先,由于篱笆存在的事实,如果恰当地予以耕种的话,沿篱笆墙的土壤,就有可能比在更容易接近的土地中央所找到的土壤更加肥沃。然而,由于在正统思想边界上出现误差和事故的概率提高了,这一潜在优势往往就被抵消。有可能碰上的树桩与石砾会多得多,对该领域的全然陌生使无意识的和非故意的转向几乎不可避免。在上述两个特性之外,我们还得加上第三个。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甚至已经让那些对我们的耕地隐喻一无所知的人都有了关于这第三个特性的印象。“好的篱笆造就好的邻居”,但如果犁地时太靠近边界线,邻居关系就有受到干扰的危险。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正统的研究者也许会建议我们尊重社会科学的现行公认边界。我们只能希望,在此三种特性中,第一个特性能盖过后两个。

本书的跨学科性质引起了种种有关内容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期望,让这两个相关但是不同的学术领域的专家都成为我们的读者,所以,本书的部分章节,对每一个领域中的专家而言,似乎是过于简单而乏味的。政治学家会发现,我们对某些传统论题的处理是天真而简单的。而经济学家则会注意到,我们对于福利理论的基本评述忽略了各种复杂的难题。我们仅仅吁求很一般的耐性,以促成对各种有趣的分析要素的明智选择。

在这本书中,我们要努力达成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一开始就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有助于我们的一些读者理解我们的分析,并且也能先期防止别人的错误批评。我们不企图为社会写一部“理想的”政治章程,因此,读者在本书中所找到的,将不过是对于很多在现代政治理论中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的暂时性参考而已。我们并不直接讨论像权力分配、司法复审、行政否决或政党这样的东西。相反,我们力图分析理性的个人在面对种种立宪选择(constitutional choice)问题时的计算(calculus)。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通过详细运用许许多多可能被提出的立宪问题来探讨该选择过程,而是仅仅参照有关各种决策规则(decision-making rules)的问题来广泛地考察该过程。此外,还要加上讨论代表制的一章以及讨论两院立法制(bicameral legislature)的一章。说明一般探讨方法的这些例子应该表明,对于立宪理论中的许多更特殊的问题是可以进行本书所做的这种分析的。

这种分析也许可以用“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这个术语来形容。人类被认为是决定私人行动(action)和群体行动的唯一终极抉择者(ultimate choice-maker)。在多少有点被误称的“市场部门”,经济学家相当详细地探讨了个人决策过程。相比之下,现代社会科学家则往往忽略了个人决策过程,这个过程必定存在于“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里的群体行动的形成过程中。理论家们拒绝把国家契约论当作对政治社会的起源或基础的一个解释——这种拒绝就其本身而言是合适的,他们还往往忽略契约论传统中那些的确给

我们提供了连接个人选择计算与群体决策的“桥梁”的要素。

不应把方法论个体主义混同于作为一种组织社会活动 (social activity) 的规范 (norm) 的“个人主义”。前一种类型的分析, 代表着一种企图, 要把所有政治组织问题都归纳为个人面对的种种取舍, 以及他在这些取舍之间所做出的选择。他的“选择逻辑” (logic of choice) 成了这种分析的核心部分, 而且无需采取任何有关终极目标或标准的指引其选择方向的立场。相比之下,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组织规范, 涉及明确地接受某些价值标准。本项工作仅仅在第一种即方法论的意义上是“个人主义”的。我们希望, 我们能在第二种即规范的意义使这项工作合情合理地做到价值中立 (wertfrei)。

如人们所建议的, 我们在这本书里用了一些篇幅讨论“宪法” (constitution)。我们用这一术语来指一系列预先达成的规则, 嗣后的行动都在这一系列规则范围内进行。泛泛地看, 一篇前言便是一部合著的书的《宪法》。既然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独立地进行其他工作之前必须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 那么前言就是尽可能充分说明每一位作者对于最终作品的贡献的合适的地方。如果我们把归于本书代理人的计算应用于我们自己, 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在以后的各种场合独立地与人相对时, 都会很想获得对于本书的所有有价值的方面的私下赞赏, 而把对于所有的舛误、遗漏以及各种大错的私下责难都转嫁给我们的搭档。要把这样的问题处理好, 写一篇简要的共同认可的“宪法”式前言, 似乎就是恰当的了。

在最为基本的意义上, 整个这本书都是一件名副其实的共同产品。所有各章都是共同而非分开写成的。我们相信, 论点是协调一致的, 各部分之间也是如此。我们希望读者会同意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协调来源于各种观念的相当幸运的一致性, 而这些观念都是独立地发展出来的, 至少在它们的创始和初级阶段是这样的。两位作者长期以来都对本书所分析的核心问题感兴趣, 而且都以不同的探究先独立地做出了贡献。布坎南在他 1954 年的两篇文章^[1]中着力探讨了市场

上的个人选择与投票过程中的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稍后,在1959年,[2]他又尝试考察了现代福利经济学对于社会中的政治组织的意义。同时,图洛克此前所关注的是,用与这位经济学家所使用的相似的动机假设,来建构一种一般的政治组织理论,他于1958年初步完成的早期工作,[3]主要是集中在科层制组织的种种问题上。

在1958—1959学年期间,弗吉尼亚大学的托马斯·杰斐逊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授予图洛克一个研究员职位,布坎南过去和现在都与该中心有联系。尽管在那一年里并未形成有关本书的任何计划,但那时所进行的讨论和争论,却代表着现在这本著作的许多具体章节的源起。在1958—1959学年的后期,图洛克完成了一项对民主政府中互投赞成票过程的初步分析,1959年6月,这一分析被送去发表,并于当年11月付梓问世。[4]这个现在成为第十章的初始文本,乃是本书终稿的第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959年夏又完成了两篇初稿,尽管仍然没有出现合著本书的任何计划。图洛克准备并散发了一篇油印的研究文章,题为《立宪理论的初步研究》,该文包含了现在的第六章所涵盖的重要核心分析的基本要素。布坎南写了一篇文章,即《经济政策、自由制度与民主过程》。他把该文递交给了1959年9月朝圣山学会在牛津召开的年会。这篇文章以一种探索式的试验性风格,提出了许多经过共同讨论的观点。[5]

为一项共同计划进行合作的最终决定,是在1959年9月做出的,并且本书的大部分实际上就是在1959—1960学年期间写成的。如前所示,图洛克阐述了第十章的论点。还应把第六章的核心模型首先归功于他。就可以把立宪计算(constitutional calculus)的两个要素分开而言,布坎南也许会因为强调了一致同意规则(unanimity rule)在(第七章所展开的)民主理论中所占的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受到称许,而图洛克的功绩则是他强调有必要把某种定量维度赋予(第八章所讨论的)决策成本(the costs of decision-making)。第五章所讨论的分析框架的初始形式,是由布坎南发展起来的,他的功劳还包括在第十一、十二、十三章中对博弈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应用。关于第十六章的两院立法制的

研究,主要是图洛克进行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其余重要章节里的观念,则是共同推导出来的。这一起着联系、资格证明和做出结论的导论性材料,可以说拥有一种首尾一致的风格,就此而言,其原因在于它在某个阶段通过了布坎南的打字机。

两个附录是分别写成的,并各自署名,尽管它们是以两种独立而独特的形式来讨论本书的论点,但明眼的读者也许能够分辨出本书的两位作者在重点上的轻微差异。似乎完全合适的是,这种差异应当存在,并且应当被认识到。

许多各式各样的批评者对本书——无论对其早期的独立篇什还是对其最终的整体——作出了评论,我们受到这些评论的干预、非难、刺激与挑战。几乎在一切情况下,它们都是有益的。我们无法把所有批评者都一一列举出来,但应当特别提到的有奥托·戴维斯(Otto Davis)、布鲁诺·利奥尼(Bruno Leoni)、约翰·莫伊斯(John Moes)和文森特·瑟斯比(Vincent Thursby),他们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手稿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批评,而且他们的批评总是富有建设性的。

这里,也有必要按惯例进行致谢。弗吉尼亚大学托马斯·杰斐逊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授予图洛克研究员职位,使这项共同工作得以开始。该中心还提供了大部分的文书工作,这些工作对于本书在其各个不同阶段的加工整理过程来说都是必要的。应当特别提到格拉蒂斯·贝森夫人(Mrs. Gladys Batson)在这方面的合作。布坎南则由于在1959—1960年间获得一项福特基金会研究员基金,而得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本计划。而且,在1961年夏,由威尔逊·吉社会科学研究所给予的一项研究拨款,则使他能够把这项工作最终完成。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图洛克在1960—1961年期间的研究提供了部分补助,如果没有这种补助,他就不可能在这本书上投入更多的时间。

詹姆斯·M.布坎南

戈登·图洛克

注 释

[1] “Social Choi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XII, 1954, 114—123; “Individual Choice in Voting and the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XII, 1954, 334—343.这两篇文章都被重印于 *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Selected Essay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6, pp.75—104。

[2] “Positive Economics, Welfar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II, 1959, 124—138.重印于 *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Selected Essays*, pp.105—124。

[3] *A General Theory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58, 私下传阅。

[4] “Some Problems of Majority Vot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XII, 1959, 571—579.

[5] 该文发表于 *Il Politico*, XXV, No.2(1960), 265—293。 *Il Politico* 是意大利帕维亚大学的出版物。

目 录

- 1 前言
- 第一部分 概念框架**
- 3 第一章 导论
- 11 第二章 个体主义假设
- 16 第三章 政治学与经济的关系
- 31 第四章 社会选择中的个体理性
- 第二部分 社会选择的王国**
- 43 第五章 人类活动的组织
- 63 第六章 广义立宪经济学理论
- 84 第七章 全体一致规则
- 96 第八章 决策成本
- 第三部分 决策规则分析**
- 117 第九章 模型的结构
- 130 第十章 简单多数表决
- 147 第十一章 简单多数表决与博弈论

- 170 第十二章 多数规则、博弈论与帕累托最优
- 188 第十三章 帕累托最优、外部成本和收入再分配
- 198 第十四章 集体行动的范围与限度
- 208 第十五章 合格多数表决规则、代议制与立宪变量的相互依赖
- 228 第十六章 两院立法制
- 243 第十七章 多数规则的正统模型

第四部分 民主的经济学与伦理学

- 261 第十八章 民主伦理学与经济绩效
- 278 第十九章 压力集团、特殊利益与宪法
- 291 第二十章 好社会的政治学
- 300 附录一 阅读政治哲学的旁注

詹姆斯·M.布坎南

- 320 附录二 理论先驱

戈登·图洛克

第一部分
概念框架

第一章 导论

政治理论关注的问题是：国家是什么？政治哲学把这个问题扩展为：国家应该是什么？而政治“科学”则问道：国家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这里不打算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并不直接对国家或某一个国家是什么感兴趣，而是打算十分具体而又十分简要地厘定，我们认为国家应该是什么。我们不会停下来与那些意见可能与我们不一致的人辩论来维护我们的意见，我们也不会详细地去考察现有的或某种理想的政府活动组织。

在给定一个明确说明集体行动目标的假定后，我们将以一种被公认为是初步的并且也许是朴素的风格来建构一种集体选择(collective choice)理论。这一建构工作需分几个步骤来进行。按我们的假定，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必定是由个体行动(individual action)组成的。因此我们的建构工作的第一步是，就个人在与私人的或个性化的活动形成对照的社会活动中的动机与行动提出某种假设。于是我们的理论就从那些在组织群体选择(group choice)的过程中行动或决策的个人开始。既然我们的模型把个体行为(individual behavior)当作它的核心特征来加以体现，那么把我们的“理论”归类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理论，或许可能是最好的。

在此我们将阐明，有必要重申的是，就其基本的逻辑正当性而言，这个分析并不依赖于社会选择(social choice)过程中个人行为的任何狭隘的享乐主义动机或自私自利动机。在我们的模型中，典型的个人可能是利己主义者，也可能是利他主义者，或者是利己与利他的任意组合。我们的理论是“经济学的”，这仅仅是因为它假定，独立的个人就是独立的个人，并且他们本身很可能对集体行动的结果怀有不同的目的

和旨趣。换句话说,我们假定,由于种种除无知以外的原因,人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那样,只有当必须用这个基本理论来发展一些有关集体选择的结果的具体操作假说时,才需要一些更为严格的假设。

任何一种集体选择理论都必须尝试解释或描述用以协调有冲突的利益的手段。在某种真正的意义上,经济学理论也是一种集体选择理论,且因此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对于独立的个人利益,如何通过交易或交换的机制来加以协调。诚然,一旦假定个人利益是同一的,经济学理论的主体部分就湮灭了。如果所有的人在利益上或者在先天或后天的资质上都是一样的,那么就不会存在有待解释的有组织经济活动。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不与其他任何人交易的鲁滨逊。因此经济学理论解释的是,人们为什么通过交易来合作:他们这样做就因为他们是不同的。

相比之下,政治理论家似乎尚未充分考虑个人差异对于政治决策理论的意蕴。通常,抉择(choice-making)的过程被看作是达成某种形式的“真理”、某种理性主义的绝对的手段,这种真理或绝对还有待于通过推理或启示来发现,并且一旦被发现,就会吸引所有的人来支持它。关于理性主义民主的种种概念,都是基于以下假定:一旦全体选民都得到了充分的信息,个人利益冲突就会并且应该消失。我们并不否认这种概念的偶然的有效性,在此种概念中,政治抉择规则提供了达成某些“真理判断”的手段。然而,我们却要对这种政治过程观的普遍的或者是典型的有效性提出质疑。我们探究集体决策过程的方法,与T.D.韦尔顿(T. D. Welton)在“个人主义民主”这一术语下所阐述的方法相似。我们的假设与他的假设实质上是等价的,^[1]但是韦尔顿强调,这样的假设引入了理论上的不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任务,是要给“一个民主的政府……所能够加以控制的人类生活领域”提供理论上的确定性,甚至要在这种纯粹个人主义的假设基础上,提供一种被韦尔顿特别指出正在丧失掉的确定性。^[2]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理论上的确定性指的是什么?经济学理论对私人选择(private choice)的组织化的解释,尚未充分到使得这位职业经济学家能够预言国民产值的精确构成、任何两种货物或服务的交换比率,或者任何用货币衡量的货物的价格。这样的预测需要的是无所不知而不是科学,因为我们必须把个人当作行动者而不是原子来对待。各种关于人类选择的科学,在其目的上都必须谦虚谨慎。它们至多能给熟练的从业者提供某种能力,来预测有组织的人类活动的结构特征,预测在各种明确定义的变量中所发生的变迁的一些方向性影响。经济学理论能够帮助我们预测的是,市场将被出清,在开放的市场上统一的产品单位将要求统一的价格,需求将随价格降低而增加——当然,总是要附加必要的假定其余情况保持不变的前提条件。

我们希望建构的政治选择理论所能做到的甚至尚不及此。这样一种理论,由于社会选择中个人行动的基本相互依赖性,从一开始就内在地显得更有难度。而在经济活动的市场组织中,个人行动的相互依赖性是非常少见的,至少就初步的分析来说是这样。集体选择理论至多能允许我们就群体决策的结构特征做出一些非常初步的预测。

群体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做出的重要选择是:集体行动与私人行动之间的分界线如何划?社会选择的范围是什么?私人或个人选择的范围又是什么?理论的职能并不是划一条精确的界线,理论只是就某种分析模型而言才具有意义,这种分析模型描述或解释群体中的个人能够由以做出这种十分重要的决定的过程。并且,在导出这种模型时,我们能够用一般性的术语来描述一个“解”(solution)的某些特征属性。

决策规则的选取本身就是一种群体选择,而且也不可能实证地讨论一个社会群体的这种基本抉择,除非有关于各种规则的仔细说明的假设。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无限回归的问题。在各种替代选择的结果都得到分析之前,个人不可能在某一具体领域中的集体行动与个体行动之间做出合适的选择。最简单的私人行动显得没有什么为难之处,最终的决策者被假定是行动着的个人。然而,集体行动却是完全不

同的。在能够恰当地把集体行动当作私人行动的一种替代而加以恰当评估之前，必须指明最终的决策权威。是某种简单多数来进行控制呢，还是必须在达成完全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做出集体决策？或者是存在意见统一的统治阶级或群体？个人对集体选择的评价，将强烈地受到他认为是普遍流行的决策规则的影响。不过，甚至当这个困难在初始水平上得到克服时，也还是允许我们仅仅分析单个的人在他自己的“立宪”决策中做出的选择。当我们认识到，各种“立宪”决策本身——必然是集体性的——也可以按若干决策规则中的任何一种来达成时，便又会完完全全地面临同样的问题。况且，在为立宪选择设定一种决策规则时，如果我们问，这种规则本身是怎样选取的，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3]

避开看上去毫无希望的方法论困境的一个途径是，在决策的终极立宪层次上引入某种全体一致或完全合意规则(rule for unanimity or full consensus)。完全撇开这种规则作为对政治现实的一种解释的恰当性不谈，它确实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可以比照这个标准来分析个体的人在立宪问题上做出的决定。在考察单个人的选择计算(the choice calculus)时，由于这种计算受到群体中所有其他个人在采取最终行动之前必须取得一致的认识的约束，所以我们能够有意义地讨论抉择规则的种种“改进”。什么时候能证明，使一个以上的人类活动部门从私人选择领域转向社会选择领域，乃是合乎需要的呢？蕴含在我们的讨论中的假定是，回答此类问题的准则，只能是政治群体中所有各方的理性的意见一致。群体中的所有个人都同意这种变化，成了可以通过变化而实施的唯一现实的“改进”办法。^[4]

然而，一致同意的达成是一个代价很大的过程，对这一简单事实的认识直接导向一种“经济学的”立宪理论。个人会发现，当预期到收益超过付出时，预先赞同某些规则是有利的(他也知道这些规则有时可能对他不利)。可以通过分析个体选择来建构的这种“经济学”理论，为政治宪法出现在那种由自由的个人进行的讨论过程中提供了一个解释，